



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

Distr.
LIMITED

TD/L.365
12 February 200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十届会议

泰国，曼谷

2000年2月12日至19日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的致词

我极为高兴和激动地欢迎各位前来参加新千年的首次联合国会议。

我们大家都一定会对泰国政府和人民给予我们的热烈欢迎深表谢意。而且我们大家也一定会感到由这样一个国家和这样一个地区作为本次会议的东道主是多么地恰如其分。

我们不会有谁会忘记，仅在两年半以前，正是在这里，随着泰铢的贬值，旧千年最后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开始了。在一年多时间里，东亚在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开辟了一条可以效仿的成功之路之后看来似乎可能实际会变成一个不稳定和贫困的新时代预言者。

谢天谢地，这些担心已证明太过分。世界经济目前又开始增长，而且世界几乎所有地区都分享了这一增长。东南亚国家，特别是泰国正领导着复苏的潮流。其他受到这一危机严重影响的主要大国，如俄罗斯和巴西现在已明显走上了摆脱危机的道路。而且事实再次显示，复苏明显由出口引导。正象本次会议的名称明确暗示的那样，贸易和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主席先生，不满三个月前，我们中许多人参加了在西雅图举行的另一次会议。我们原以为我们到那里是要参加发起新一轮的贸易谈判，我们曾希望把这一轮谈判称为发展回合，因为它将最终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自由贸易向它们经常许诺的好处。

BKK. 00-077

GE. 00-70062 (C)

可惜那一轮谈判迄今还未发起，众多的说法是它在西雅图受到了为保护其与众不同的权利而携手冲上大街的世界人民的阻挠，他们反对一群无名无姓的国际官僚主义者企图强迫他们所有人吞食经改变基因的相同食物。换句话说，无论看来多么自相矛盾，全球爆发了一种反对全球化的群众性起义。

不过，事实则更为朴实。这一轮没有发起是因为各国政府，特别是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的政府未能就它们的优先事项达成一致意见。我要高兴地说，发展中国家在贸发会议的帮助下在以前的各次会议中发挥了更为积极和团结的作用，但工业化国家则仍然处于相互之间的纷争之中。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原则上都赞成自由贸易，但它们往往又缺乏政治力量来迎战它们本国中依赖保护主义做法的那些人。它们还没有能够向它们的人民阐明我们所有人在一个全球市场中所具有的更广泛的利益，在这个市场中，每个人均能够从中获益，而不仅仅是几个少数幸运者。

街上的抗议示威自有其重要的方面。它们反映了许多人对全球化，对全球化对就业和劳动标准、环境、公众健康、人权和文化差异的影响所感到的忧虑。这些忧虑确实需要由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在国家一级、有时还需在国际一级加以处理。在许多这些领域中，已经达成了有关普遍价值和共同标准的协议，这是许多会议和长期谈判的结果。现在需要的是各国信守诺言，履行其同意的义务。现在存在的国际机构——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能帮助它们作到这一点。当然如果这些机构能够获得资金和援助来履行其职责，那么它们可以作出更大的贡献。

发展的正确含义包括在抗议者所担心的所有领域中取得进展。一个发达国家是指允许其所有公民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和健康的生活的国家。而一个真正的发展中国家则是其民间社会不仅能够坚持要求物质福利，而且还坚持要求改善人权标准和环境保护的国家。

从这一广义上而言，全球化难道是发展的敌人吗？当然不是。当然全球化肯定会造成受害者，正象人类社会的任何历史变迁肯定会造成受害者一样。而那些从全球化中获益最多的国家有义务尽更多力量照顾那些受害者，而且它们这样做符合它们的最佳利益，因为否则的话它们可能会遭遇一场全球性的激烈的反冲，使它们获得的所有益处化为乌有。

但是，在今日十分不平等的世界中的主要失败者并不是那些受全球化过多影响的人，而是那些被摒弃在外的那些人。在此我要引用《金融时报》最近一份文章中

的话，“世界上最贫穷的社会和人民与其说受到了现代经济体系的剥削，还不如说被完全排斥在这一体系之外”。

主席先生，本次会议应当特别关注的问题正是这一排斥问题。世界如此众多的部分被排斥在全球化的好处之外，这是如何发生的，其原因究竟为何？

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因为发展受到工业化国家仍对发展中国家出口设置壁垒的阻碍。我在西雅图本来有很多话要讲，至少是如果抗议的人让我发言的话。但在这个会议上，已没有什么必要谴责工业化国家的保护主义了。

你们各位中很多人对此已经太了解了。

相反，在这里可能需要强调的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特别是它们的领导人。繁荣将对这些领导人作出评判，我想首先是他们作了什么，如何推动他们的国家与世界经济的结合，如何确保它们的全体人民受益。

主席先生，我到这里来不是讲授经济学的。这个大厅里可能至少有 1,000 人比我更懂经济学。我不想假装知道答案。但我认为这次会议应当考虑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我们如何能够确保更多的国家从出口带动的恢复中获益，确保在各国国内贸易带来的好处得到公正和普遍的分配？换句话说，我们如何使贸易给穷人带来好处；

其次，我们如何能够保证所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的穷人，能够从私人投资的增长中获益，能够以支付得起的利率借贷？我们知道，私人资本流动的有些障碍，如邻国正在发生的冲突，对有些国家来说很难克服，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海外发展援助是否可以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补贴投资者支付的风险费用呢？

还有，我们如何使新技术更加普及，保证它们得到更好的利用？从班加罗尔到圣保罗，我们都看到新技术带来巨大变化的不寻常的实例。不仅微软公司在印度投资几十亿美元，而且印度的软件公司也在买下美国的公司。但世界上仍有一半的人从来没有打过或收到过一次电话，更不要说见过电脑了。带来变化的条件是什么呢？哪些条件可以使国家提供而不是成为绊脚石呢？我们又如何能够使发展中国家从技术和医学的进步中受益——目前这方面的专利使它们难以企及——又不会减少对工业化国家取得那些进步的人的刺激呢？

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小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找到出路方面，外援是否能够发挥作用呢？我们是否可以借鉴 Grameen 银行的经验呢？由于这家银行的办法，孟加拉

的农村妇女现在有了移动电话，能够核对她们产品的世界价格，而不必听任中间人的摆布。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在旧式的政府间合作之外，建立起新的伙伴关系，在我刚刚讲到的广泛的意义上推进发展事业呢？一年前，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我曾建议在商业界和联合国之间形成一种全球的紧密联系，在这种关系下我们帮助私营部门在人权、劳工标准和环境领域满足国际接受的原则。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些新的计划，如 Netaid——联合国开发计划署、Cisco Systems 公司和娱乐界之间的一种伙伴关系，提高对世界极端贫困现象的了解和筹集克服这种现象的钱——还有接种和免疫全球联盟 GAVI。我相信，今后还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很多不同形式的合作仍有待我们去构想。

还有，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保证在今后讨论国际贸易规则时不仅能够听到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而且要听取它们的声音？贸发会议、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和在双边采取行动的捐助国政府，都在设法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准备应付国际谈判，和落实一旦达成的协议。(这方面的费用可能会超过一些最小和最穷国家整个一年的预算。)或许公民社会和商业界在这方面同样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后，我们大家可以做些什么，使最不发达国家——那些现在发展只是图有其名的国家——能够在世界发展的上升台阶上取得它们的位置？那些国家中有很多已经取得了痛苦的教训，单纯的资源转让并不能解决它们的问题。它们经历了痛苦的政策调整过程，但在很多情况下收效甚微——不论是从债务减免上，还是通过其他形式的援助，或在改善它们的产品进入市场的条件上。是不是达成全球新政的时机已经成熟？使那些坚持一套议定政策的国家保证能够得到这些好处，而那些政策既有利于投资，又能保证全体人民都能分享其好处。任何成功的工业化国家为帮助它处境最为不利的或欠发达的地区追赶上来所做的一切，我们能够不在世界范围内作出尝试吗？

主席先生，这些是我提出的问题。可能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问题。但不论你们审议的具体情况如何，我都希望你们不要忘记一个压倒一切的目标——使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参加新的全球经济，都能得到它的好处。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有共同的标准，由各国在多边机构中共同努力制定和实施，但首先是植根于共同的价值。归根结底，是共同的价值使每个社区凝聚在一起。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所有地方的社

区莫不如此。当今各国的社会也是如此。对我们现在刚刚开始建设的全球社会，也必然如此。

-- -- -- -- --